

何乃英 / 著

比
较
文
学
与
世
界



文
学
学
科
建
设
丛
书

探索与开拓

江西教育出版社

—— 东方文学论文选

本书是从作者1980年以前论文中精选出来的，
对和东方其他国家文学研究三个部分

文学研究 日本文学研

北
京
大
学
人
文
学
科
学
院
学
报

探索与开拓

——东方文学论文选

何乃英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何乃英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ISBN 7 - 5392 - 4066 - 0

I . 探... II . 何... III . 文学研究 - 东方国家 - 文集 IV . I30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692 号

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

TAN SUO YU KAI TUO——DONG FANG WEN XUE LUN WEN XUAN

何乃英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 - 2250 册

ISBN 7 - 5392 - 4066 - 0/I·31 定价:25.00 元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40 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 [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E - mail: jxeph@public.nc.jx.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缘起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科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对原有学科进行大规模调整与合并时,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将它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我们认为,这样的合并是符合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的,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今后我们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上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有力的学科依据。

缘 起

1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名牌老系,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面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积累。50年代前期,在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全国最早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最早开办俄苏文学研究生班,最早编写东方文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改革开放后,在陈惇教授、匡兴教授、陶德臻教授等先生的努力和主持下,被批准建立了全国首批世界文学硕士点,在全国首批组建了比较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率先招收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我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我们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责任、有条件,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

贡献。

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手,成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出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丛书》将从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发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科上的优势和特长,在以前研究较薄弱和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内立意选题,推陈出新;在传统旧课题的研究中更新观念,创设新体系,运用新方法,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陆续推出一批填补空白的、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急需的著作。到2002年下半年,即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时,基本实现出版计划,并以此作为我们给校庆的一份献礼。我们期望,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21世纪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列为“十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编辑出版委员会

2000年12月28日

前 言

什么是东方文学

本书既然称为《东方文学论文选》，那就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东方文学”这个问题。东方文学是与西方文学相对而言的。我们习惯上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文学为西方文学，而称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为东方文学。那么，为什么要将亚洲和非洲文学称为东方文学，并且将它作为世界文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文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地理、历史、政治和文化体系等方面加以考察。

这里所谓的“东方”，首先当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也就是说，由于亚洲和非洲位于世界的东方，所以把亚洲和非洲文学叫做东方文学。但认真考虑一下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很严密，并不很科学。因为世界的东方，自然应当是指地球的东半球，也就是东半球。可是按照严格的地理概念，东半球和西半球是以本初子午线（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原址的经线为零度经线，也称本初子午线）为界的，本初子午线以东的半球称东半球，以西的半球称西半球。依照这个标准来划分，亚洲无疑属于东半球，非洲的大部分无疑属于东半球，但连欧洲的大部分也应属于东半球，大洋洲也应属于东半球。非但如此，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为使非洲和欧洲完整，习惯上以西经20度和东经160度的经线圈划分东、西半球，这样一来不但亚洲和非洲属于东半球，连欧洲和大洋洲也属于东半球，只有北美洲和南美洲才属于西半球。而且，即使不按照严格的地理概念，只是按照一般的说法，从经度来看，非洲也不比欧洲偏东。由是可知，仅仅依据地理概念还不能把亚洲和非洲文学界定为东方文学，还得从其他

方面考虑。

这里所谓的“东方”，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政治概念，即同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政治形势有联系。事实上，“东方”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据季羨林先生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考证，在古代，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凡是在中国以东的就叫东方，凡是在中国以西的就叫西方。例如，日本在中国以东的海岛上，所以长期被称为“东瀛”（“瀛”是大海的意思，“东瀛”指东方的大海，也指东方大海海岛上的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在中国以西，所以历来有“西方”、“西洋”之类的称呼，如在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印度是西方极乐世界，明代作家吴承恩描写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的长篇小说名叫《西游记》，《明史》认定“婆罗”即“文莱”为东洋、西洋的分界处，明代探险家郑和之所以被说成是下“西洋”，是因为他的航海旅行已经越过“婆罗”即“文莱”，达到了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东部一带，随同郑和出使的人写了不少游记，其中有个名叫巩珍的人写的就叫《西洋番国志》。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方，西方列强国家成为侵略者，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成为被侵略者（日本或许可以算是惟一的例外，它起初虽然也曾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但并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且还曾一度侵略其他亚洲国家），中国人的东方、西方观念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这时起，人们开始把欧美国家称为西方国家，而把亚非国家称为东方国家了。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确是在亚洲的西面，而非洲国家虽然也在亚洲的西面，但却与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命运相同，所以没有被列入西方的范畴。于是，所谓“西方”，就自然而然地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而所谓“东方”，也就自然而然地与“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侵略和压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把亚洲文学和非洲文学放在一起加

以考虑了。正因为如此,作为东方文学之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和非洲文学便不仅在地理上有一定的联系,而且在历史上和政治上有一定的共同性。这里所说的共同性,既包括它们都在近代以来的作品里表现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感情,也包括它们都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进程中走过大体相同的道路。

除此之外,我们在建立东方文学学科时,还考虑到了文化体系的问题。什么叫做文化体系呢?季羨林先生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的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其间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和巩固,色彩比较鲜明,并能形成独立体系的,叫做文化体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整个世界文化可以分为四个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都对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前三个文化体系都在亚洲和非洲,主要影响的是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也就是东方文学;后一个文化体系在欧洲,主要影响的是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文学,也就是西方文学。从这一点来说,亚洲和非洲文学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既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也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上。这是我们建立东方文学学科的另一重要依据。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建立东方文学学科,归根结底是因为目前在世界各国(至少是绝大多数国家)研究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学术领域里,作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西方文学早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大有以这个体系取代世界文学的态势;而作为世界文学之另一部分的东方文学却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至少尚未构成为许多人所承认的体系。依笔者看来,随着世界各国文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文学的形成趋势越来越明显,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如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闭塞状态已被打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并且给东西方文学以适当地位的世界文学体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西方文学取代世界文学或以西方文学为主体而以东方文学为陪衬的世界文学体系。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我们很有必要建立东方文学学科。

为什么要研究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古代,东方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文学的发源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人类首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并创作了第一批文学作品。其后,西亚的伊朗高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以及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也相继进入了文明社会,创作了文学作品。在中古,特别是在15世纪以前,东方人在文学上再创辉煌,独领风骚达数百年之久,当时的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以及日本等均可称为文学大国,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方面涌现出一系列名篇佳作,堪称当时世界文学的高峰。到了近代以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东方文学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引人注目,但仍然创作出为数不少的好作品,在世界文坛上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至于现代东方文学,则正随着东方各国人民的日益觉醒和东方各国经济的日益繁荣而蓬勃发展。展望21世纪,我们对于东方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坚信它必将在今后的世界文坛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言以蔽之,自古以来东方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能一笔抹杀的。既然如此,我们要研究世界文学,当然就需要研究作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东方文学。

不仅如此,研究东方文学还对研究整个世界文学具有重要

意义。既然世界文学是由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那么单纯地研究西方文学自然就不能达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世界文学的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不难理解,只有既研究东方文学,又研究西方文学,并将二者加以比较对照,才能真正认识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才能充分揭示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才能深入理解世界文学的本质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不研究古代的东方文学,就会人为地把世界文学的开端推迟数千年,以为世界文学史始于古希腊文学;如果不研究东方的三大文化体系,就无法全面认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以推动世界文学前进的规律等等。甚至于可以说,仅仅研究西方文学,那就不但不能达到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的目的,而且不能达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的目的。譬如,如果不研究属于东方文化和文学范畴的希伯来文化和文学(主要集中在《圣经》里),就无法全面说明作为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两个源流(即所谓“二希”,一个是古希伯来文化和文学,一个是古希腊文化和文学),因而也就无法深入领会许许多多的西方文学作品;如果不研究印度的《五卷书》、阿拉伯的《卡里来和迪木乃》等作品,就很难解释西方许多故事集(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和拉·封丹的《寓言诗》等)中若干故事的来源;如果不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加以比较,而是只在西方文学的内部比较来比较去,那就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关于西方文学特征的正确结论来等。

然而,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原因,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恶劣影响,上述事实仍然没有为许多人所接受。所谓“欧洲中心论”,是某些西方人凭空制造的理论。在他们看来,欧洲(和美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和美洲)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甚至就是世界文化的全部;欧洲(和美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甚至就是世界文学的全部。因此,他们所写的世界历史是以欧洲(和美洲)为中心的历史,甚至就是欧洲(和美洲)的历史,他们所

写的世界文化史是以欧洲(和美洲)为中心的文化史,甚至就是欧洲(和美洲)的文化史;他们所写的世界文学史是以欧洲(和美洲)为中心的文学史,甚至就是欧洲(和美洲)的文学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的表现。但不幸的是,这种理论的流毒甚广甚深,不仅影响到西方很多人,而且影响到东方一些人。再加上我们一向对东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介绍和研究较少,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进,可是仍然远远不够,所以人们对东方文学的了解很少。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欧洲中心论”,大量翻译、出版东方文学作品,广泛介绍东方文学,深入研究东方文学。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且是一个东方大国;我国文学属于东方文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忽视、压低或否定了东方文学,那实际上也就等于忽视、压低或否定了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因为“欧洲中心论”者不仅忽视、压低或否定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学,同时也忽视、压低或否定我们中国的文学。因此种种,我们可以说,下大力气翻译、出版、介绍和研究东方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当仁不让的义务。不言而喻,我们重视东方文学,决不是盲目地、片面地夸大东方文学的成就和抬高东方文学的地位,决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跳到“亚洲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而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事物以本来的面目,准确地评价东方文学的成就,充分肯定东方文学的地位。

我与东方文学

我是195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提起195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新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和“大跃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在学校里还有“教育大革命”运动。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教育大革命”运动呢?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以至全国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东方文学”就是在这个运动里诞生的。在此之前,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只讲西方文学。在“教育大革命”中,人们认识到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于是,中文系组织一部分外国文学专业的进修教师、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班学生(包括我在内)着手摸索东方文学,一面搜集资料,一面编写讲义。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竟然“白手起家”突击编出了一本《东方文学参考资料》,这本书于同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之一。它大概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这类性质的书籍。《东方文学讲义》其实也突击编写出来了,可是由于觉得没有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所以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

要问我为什么参加东方文学编写组的工作,自己当时的想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参加这个编写组的人比较少(如果我记的不错的话,当时参加这个组的本科毕业班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去试试。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可是,不料这一下子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因为,到同年7月毕业时,我便被留在学校中文系,并被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室,任务就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干这个专业的,因为这个专业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师指导。但是,我必须“服从分配”(那时的人几乎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那么,我到什么地方去求援呢?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那里可以说是中国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地,许多从事东方文学(特别是东方国别文学)教学研究的人都是在那里毕业的。于是,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

我经常到北大去取经,听他们的课,要他们的讲义,可谓受益匪浅。季羨林、金克木、刘振瀛、颜保、韦旭升、刘安武和张鸿年(我跟张鸿年是后来认识的)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看过他们的讲义,读过他们的著作,请他们解答过问题。我深知,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自己是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再一个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中文系的同行合作。当时比较积极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北方,特别是华北和东北地区。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过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共同编写东方文学教材的工作,这份教材在1966年“文化革命”前实际上已经写好,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出版,并且后来一直未能面世,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尽管如此,我们彼此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逐渐摸索出一条在中文系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的路子来。因此,我也应当感谢这些志同道合的同行们。

虽然这样,在“文化革命”以前,我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始终处在摸索阶段。究竟怎样才能闯出一条道路呢?我还是不断地犹豫和徘徊。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一会儿想学好日语,一会儿又想学好英语。其结果是,两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革命”开始了,几乎所有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停止了,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停止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现在说来有点可笑,记得当时的新华书店里只摆着一种东方文学的书,那就是《小林多喜二选集》,大约认为只有小林多喜二不算是“封、资、修”作家,只有他的书不算是“封、资、修”作品吧),我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然也就不能不停止了。在“文化革命”期间,我除了参加政治运动以外,还“客串”评过《水浒》,讲过毛泽东诗词和鲁迅作品。因此,“文化革命”以后,我已经不想再回到东方文学上来,而是想去研究中国文学,觉得研究中国文学得心应

手,既没有语言障碍,也不愁缺乏资料。但是,我这时不得不又一次“服从分配”,不得不重新回到老本行——东方文学上来。

这时,已经是70年代后期,我已经越过“不惑之年”,越过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我想,我再也不能徘徊下去,我必须下定决心学好日语,认真研究东方文学,走出自己的专业道路。幸运的是,在这时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出台,80年代初(1981~1983年)我终于踏上了东瀛留学的道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苦读了两年书,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上面。

因此,我虽然说是从一毕业就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可是真正安下心来进行这项工作,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即从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约有二十几个年头。在这二十几年里,我还应当算是比较努力的,先后给本科生、函授生、自学高考生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上过许多次课,培养了若干名研究生,发表了一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十几篇译文,出版了二十多部论著、编著和译著,此外还与别人合作出版了若干部书,可以说在教学上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满足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写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水平不高,而且存在不少的缺点甚至错误。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初创阶段开始的。当时,我们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料十分缺乏,研究水平相当低下,研究条件也很差。就研究条件来说,比如发表文章的刊物很少,出版书籍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尤其不利的是,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还不能不经常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在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片面强调政治挂帅,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片面强调思想性而轻视艺术性;而在东方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则除了这些方面以外,还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文

学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对“文化革命”以前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影响很大,直到 70 年代后期“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并不具备做好这方面教学研究工作的充分条件。先从语言来说,我只懂日语,但不懂其他许许多多的东方民族语言,所以我写日本文学以外的文章时总有不踏实之感,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以泰戈尔而论,因为我很崇敬他,而他又是我们的教学重点,所以我写了两本关于他的书,写了二三十篇关于他的文章,有的人甚至误以为我是泰戈尔研究者;但其实我并不真正了解泰戈尔,因为我不懂孟加拉语,我只能靠别人的译文来理解他,这怎么能深刻呢!再就日语来说,我虽然也算是懂日语,我看了不少的日文书,也翻译了不少日文书,但我明白我对日语若干词语的理解还很不够。我越学日语越觉得日语是无底洞(其实任何外语都是如此,尤其是对研究文学的人来说难度更大)。以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而论,我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我的确仔细地看过他们的原文小说和其他文章,写过和译过关于他们的几本书,还写了几十篇关于他们的文章;但说老实话,我对他们的理解也是有限的,也是不够深入的。因为当我看他们的作品时,也许懂得了其中的基本的意义,可是却很难更深入地去体会那些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的内在的、细微的味道。再从资料来说,关于日本以外国家的文学,我只能依靠二手资料,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关于日本文学的资料,我也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国内图书馆的藏书有限,我自己的藏书更是有限(我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日本读书会”有联系,他们送了我不少书;我还有几位热心的日本朋友,他们也常送我书)。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自己所需要的所有资料,特别是日本新出版的资料(而日本的出版事业又十分发达,新资料层出不穷,我真的只有“望洋兴叹”)。所以,

从语言和资料两方面来说,跟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比较起来,我的研究有自己的弱点,并且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当然,这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不想表示后悔,更不想埋怨任何人。

第三个原因是我的研究工作往往是在一些主观压力和客观压力的干预下进行的。例如,为了评职称,为了抢时间,为了赶进度,我不得不尽快地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去,顾不上反复思考,顾不上仔细推敲,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急就章”,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遗憾的是,很多东西一旦发表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后悔,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类似的错误。这些也已成了既成事实。不过,好在我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制止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不需要再被职称控制了,也不需要再忙着抢时间和赶进度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公开说明自己的问题,并不是为了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上,也不是为了表示自己谦虚,而是想让后来者接受我的教训,让他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重犯我的错误。怎样才能不重蹈我的覆辙和重犯我的错误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握正确的教学研究方向,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具备研究东方文学的充分条件,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摆脱那些主观压力和客观压力,以便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联系我国东方文学教学研究的实际,回顾自己大半生所走过的道路,我想在这里谈几点体会,也许对后来者(尤其是像我一样毕业于中文系的人)有所启示:

一是要千方百计创造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语言条件。众所周知,东方文学所涉及的语言很多很复杂,而且几乎都属于所谓“小语种”,学习难度较大,学习条件较差。但是,不管学习东方语言如何困难,我们都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不放,非要拿下不可,千万不要犹豫不定。我以为至少要学好一种东方语

言,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好,是要达到精通。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够学好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东方语言,那就更好了。除东方语言外,学好英语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进行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时候。以上说的是外语,另外还要学好汉语(也许有人觉得我说要学好汉语很可笑,其实并不可笑),无数事实证明,没有一定的汉语修养,就很难把东方文学作品准确地翻译出来。

二是要采用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所谓点面结合,就是既要确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作家)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又要全面研究东方文学。只有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才能深入下去,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只有全面研究东方文学,才能适应东方文学教学的需要,才能真正认识东方文学的全貌,才能在建设东方文学学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世界文学,包括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现在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年轻的研究者不仅早已在认识上走在我的前面,而且早已在行动上走在我的前面)。作为中文系的东方文学研究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中文系的优势,深入进行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为了进行这样的比较研究,我们一方面要对东方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二者缺一不可。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后来者的累累硕果,我衷心地希望他们比我高比我强,希望他们把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事业推上新的高度。

这本书是我的论文选集,共计收入 28 篇论文。这些论文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为了尽量保持发表当时的原貌,其中大多数论文原封未动,只有少数论文有些改动。另外,